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八）

安排私方人员。中共中央于1956年7月10日发布《关于安排原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时私方人员和在职人员的指示》，指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在职人员必须全部包下来，给予安排。”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对资方人员的安排，是一种必要的赎买办法。”为此，银川市委和政府依据“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和“团结、教育、改造”的原则，对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基本上都作了适当的安排。1956年银川市安排私方人员1358人。其中，国营企业586人，公私合营企业164人，合作商店608人。私方人员的家属924人，市政府也都作了安排，其中参加工厂劳动的91人，当营业员的104人，参加街道工作的298人。此外，还有一部分私方家属参加了市工商联办的鸡鸭场、养猪场和家属缝洗厂的工作。

市委和政府还对私营商店原有工商联委员、同业工会主任、委员等130人中的125人作了安排。其中，安排为市公司副经理的2人，副董事长7人，公司科、股长各2人，董事20人，副主任14人，理事会主任1人，委员4人，组长2人，加工厂厂长1人，门市部主任39人，共计93人。

对上述人员的安排，绝大多数人是满意的，他们在各自新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其特长和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另外，在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还对银川市少数民族小商贩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安排。1956年，全市共有少数民族小商贩376户，多数经营牛羊肉和饮食业，极少数从事手工业。他们的资金少，营业额不大，困难多，仅能维持一般生活，淡季往往连一般生活都无法维持。针对这一情况，政府把有能力从事企业和商业工作的商贩户接纳到公私合营企业或合作商店；对其他人员，根据自愿的原则，由国家拨款扶持转入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当时将87户转入农村。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商贩的出路。

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期间，银川市根据便利群众，便于核算的原则，还对全市的商业网点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采取“统一规划，一般不动，个别调整”的办法，基本解决了银川市商业网点不均的情况。

银川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没有引起社会大的动荡，也创造了一些独特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企业的生产资料已基本上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由国家统一支配和使用，企业的性质也基本成为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的一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完全纳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管理中。把原来的利润分配制度改为定息制度，资方按照其股金的数额，每年获得5%的定息。虽然这仍是一种剥削收入，但已不随企业生产、经营盈利的增长而增加，使资本家的剥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工人的工资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态，而是初步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工人完全摆脱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成为企业的主人。资本家在企业中不再以资本家的身份来行使职权，而是作为企业的一个劳动者，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在团结和教育私营工商业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为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夏，由于农业合作化高速度发展的影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发生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存在改造的速度过快过急、公私合营一哄而上、工作粗糙等问题，特别是银川市面对绝大多数小商小贩的特殊情况，出现了“一鞭子赶”的现象，把一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也当作资本家对待，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对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一一作了纠正。据1987年银川市委统战部《关于银川市落实统战政策的工作汇报》中记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银川市纠正了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时错定为资本家的“三小”（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人员291人。

（据银川党史网）

华夏独绝奇石山 旅游胜地名在外（五）

美好的心，是会产生更美好的梦想的。有梦想就会有奇迹，在泛生着梦想的年代，中华奇石山呈现出的美的奇迹，定会更加灿烂和辉煌。

一座城，一颗心。这颗心，承载的风光无限；这颗心，绿得恣肆而又昂奋；这颗心，承载的精神文化广阔而又厚重。都说文化决定未来，中华奇石山，是一座城市承载着厚重文化和美丽梦想的心！

半城山水半城绿，半城绿色惹人醉，无疑是对今日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自然景观的最形象的描绘。在这个日益被江南水乡梦想浸润的塞北小城，粗犷与风沙渐渐隐去，宁静与精致缓缓凸显，漠北的雄浑与江南的旖旎，正以一种和谐又赏心悦目的姿态重新缔造着一个新的城市容颜。如若想在这个日益宁静又和美的城市中寻觅昔日塞北的坚韧与刚毅，中华奇石山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偷得浮生半日闲，人间去处有奇山。

2000年，石嘴山市因成为挪威埃肯碳素集团在亚洲的第一家生产基

远山夕照。

地，曾惊羡了无数世人的目光。世界大型跨国公司落户石嘴山，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远万里从北极将一块黑色北极石运送到中国、运送到宁夏石嘴山，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中华奇石山的奇，还在于它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自然奇石，临沂奇山、灵璧奇山、泰山奇石，200余块奇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宁夏石嘴山，这是怎样坚如磐石的信念，才能将石头和文化完美融合？一块石头的重量，无数场长途跋涉的艰辛，运送石头的决心和毅力，如何能用言语分辨得清。奇石自远方来，自有新的故乡将它安放。故乡的奇石在山里，梦想着重见天光。举全市之力，石嘴山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受命自贺兰山自行拉运自然石头4.2万余块。巨石掸去千年风霜，自大山深处熙熙攘攘奔向奇石汇聚的地方。你向我张望，我将你打量，奇石欢聚的“盛宴”就此上场。

一石一灵性，一石一主张。石头是静态的、冷漠的。被冠以文字的述说，各种寓意的象征，石头又有了温度，以及由温度衍生出的无尽的文化内涵。石头是刚毅的、坚韧的。被冠以各类中华大家的事迹解说，石头又有了活力和生命，以及由此生发出的绵延的传承和厚度。

奇石山居城傲立，星海湖绕石流淌。绿意葳蕤，鲜花盛开，有山有水有奇石。石显阳刚，水映灵秀，奇石山无疑是星海湖的点睛之笔。一座粉煤灰山，让石嘴山哭泣了二十多年；一座中华奇石山，让石嘴山旧貌换新颜，平添绝世欢颜。这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更是一座城市吐故纳新、励精图治的震撼宣言。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五）

战斗结束后，史团长叫各营把土匪集中到一块儿，在30多名土匪中，想找出郭栓子、张绪绪。在一个一个登记名字时，王连长把李学珍带来了，史团长问：“哪个是郭栓子？”李学珍打着哆嗦，不敢开口，朝一名黑脸土匪撅了撅嘴。史团长大步走到郭栓子面前，瞪着大眼说：“你就是郭栓子吧？”郭栓子耷拉着脑袋，半天从嘴角挤出一个字：“是！”这时部队一片欢腾，陈宝良和战友们把枪举起来，情不自禁地高呼：“我们把郭栓子抓住啦！”活捉郭栓子的大好消息，很快传遍了贺兰山区，回汉人民好像第二次解放一样，欢天喜地，众口称赞：“解放军为宁夏人民除了一大害，我们永远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解放军！”

紧接着，部队又活捉了张绪绪，并缴获了土匪用的电台和一大批枪支、弹药，取得了贺兰山剿匪的重大胜利。

10月14日，贺兰山另一匪首谢占奎带领7名土匪向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投降。至此，贺兰山股匪除张成皋、董乱子、孙强等少数匪首潜逃外，其余均被歼灭。银川、宁北地区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10月21日，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贺兰山剿匪部队予以通令嘉奖。

11月19日，省人民法院在银川市东教场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匪郭栓子（郭永胜）、张绪绪（张怀中）、张恒玉、吴国昌、徐四，杨格娃等33名土匪被分别处以有期徒刑。

12月14日，宁夏军区党委召开剿匪工作会议，总结全省一年来的剿匪工作，提出部队要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军政兼施，分别对待”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打击与争取相结合”的政策，要求务必根绝匪患、取得剿匪斗争的最后胜利。

小蟊贼命断通贵寨

1950年农历三月，在永宁县九区四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通贵，发生了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称通贵“三一五”暴乱。

此次暴乱的匪首是混入永宁县惠农渠水利段的特务分子强德。强德与郭栓子相勾结，通过活动，勾结拉拢30余名匪徒武装袭击通贵乡政府。这次暴乱前强德先做通四乡五村村长马生华工作，然后去河滩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分头行动。

农历三月十四日下午，通贵乡（四乡）政府抓住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当晚，乡长马仁杰从区上开会回来，副乡长丁保宣向他汇报说：“这两个人是从西门进来的。一个坐在刘万珍的铺子门前，一个坐在王万义的门前。我问他们是干啥的，他们说是惠农渠上的民工‘字使’（即文书），但问了一些民工却都不认识。我们盘问，他们前言不搭后语，所以就把两个人带到乡上看管了起来。”马仁杰听后，立即赶到乡政府。进门一看，一个是马长明，另一个不认识。据乡文书马占江说：“马长明在马鸿逵部队训练保甲长时当过分队长。这个人胆子大，性子野，不干正事，是新城门上的人。”正当马仁杰等商量如何处理这两人时，只见强德骑着一匹马飞快地跑来，高声喊叫：“丁乡长！马乡长！这两人我保了，有啥事我都承担。”听了强德这一番话，解放军工作组组长警惕起来。这时，马占江便对强德说：“你要保这两人，就得保我们通贵一个月不出事。”强德一听就火了，气势汹汹地说：“我保人，还能保你通贵不出事？”说着扭头就走了。

强德走后，乡政府研究决定让副乡长丁保宣带上枪把两个人绑上押到了区政府。

农历三月十五日夜半时分，马仁杰和解放军工作组组长白玉鸣在乡政府听见房顶上响起了脚步声，白玉鸣从炕上跳了起来，紧握着手枪，靠在窗户边上，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凭借月光看见两个人正用一把明晃晃的刀子悄悄拨开西屋的门，拨开后见屋里是空的，一个匪徒又向他们住的屋扑来。白玉鸣迅速下炕，隐藏在门与窗户之间的墙壁处，做好了战斗准备。马仁杰也趁机趴在土火炉的后边。那个家伙又拨开了东屋的门。白玉鸣手疾眼快，随手“啪啪”就是两枪，只听见“哎呦”一声惨叫，黑影缩了回去。这时外面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嗖嗖”朝东屋射来。按白玉鸣的布置，马仁杰端枪把住窗口。只听见一个土匪（好像是强德的声音）一边打枪一边喊叫着：“外面的人都快进来！”接着就听到院内响起一片脚步声。此时，白玉鸣非常沉着、机智，他发现一个土匪贴着墙根朝自己住的窗前一步一步移动，瞄准就是一枪，只听那家伙“啊呀”喊了一声倒在了地上。接着，其他土匪便一溜烟似的都逃走了。第二天天亮一看，被白玉鸣击毙的两个匪徒，一个是马生华，另一个正是匪首强德。

原来，就在农历三月十四日下午，由于白玉鸣和乡政府的同志扣住了两个土匪，一个是惯匪马长明，强德没能保出来，生怕暴动计划暴露，就决定第二天夜里提前采取行动。那天夜里，强德把串联好的30余名匪徒召集在一起，决定第一步先搞掉四乡的解放军工作组组长白玉鸣和乡长马仁杰，第二步袭击区干部。由于白玉鸣击毙了匪首强德和马生华，其他土匪一看不妙，就一个个仓惶逃到河东渡口一带去了。

正当宁夏及银川的剿匪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乘火打劫，散布于城乡之间的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反动会道门和残匪又蠢蠢欲动，剿匪斗争进入军政结合、细密搜剿、根绝匪患的阶段。

驻宁部队六十五军和军区独一师一部调往抗美援朝前线，西北独二军缩编成立的新独一师、西北军区四军十师承担了以贺兰山区为重点的波及全区的剿匪任务。从1951年1月至翌年5月，经过剿匪部队的多次围歼，捕捉俘虏张成皋匪首以下172人，缴获长短枪38支。至此，贺兰山一带的匪患彻底肃清。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宁夏剿匪斗争，共消灭大小股匪24股，打死、打伤、抓获土匪共3200人，缴获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2500余支，战马1匹、电台1部。人民解放军驻宁部队在剿匪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也付出了血的代价，57名指战员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光荣牺牲。地方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和参加剿匪斗争，是剿匪战斗取得胜利的保证。在剿匪斗争中，民兵参战73次，收缴枪支1941支，破获匪特案件117起，捕捉特务14人，反动头目200余人，不法地主170余人。

清剿土匪斗争在党政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取得了最终胜利，彻底消除了危害各族人民群众近百年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英勇壮举将永载史册。

（据银川党史网）

吹响宁夏解放的胜利号角（二）

从9月10日起，右路人民解放军六十四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第二师，在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的率领下，由固原、海原等地出发，沿平（凉）中（宁）公路开进。12日，一九〇师解放同心县。为切断中宁守敌退路，六十四军一九一师穿越荒无人烟的沙漠荒原，战胜暴风雨的袭击，强行军170里，14日直取中宁县北部重镇鸣沙洲，守敌贺兰军见势不妙，闻风而逃。第一九〇师解放中宁县城。16日，第十九兵团3路大军10万之众，从黄河南北两岸进入河套地区。右路与中路兵陈黄河右岸，与中卫隔河相望，左路一八八师从北岸逼近中卫，陷敌八十一军于绝境。至此，马鸿逵第一道防线已被突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使宁夏敌军一片慌乱，内部矛盾日渐激化。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形势下，马鸿宾父子决定率部起义。9月19日，国民党八十一军宣布起义，“宁马”第二道防线不战而破。

围歼金灵之敌

国民党八十一军起义的当天，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仓皇乘飞机逃走。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率一二八军、十一军和贺兰军，以地势险要的牛首山、广武岭为屏障，在河东地区重新部署兵力，企图挽回败局。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在金（积）、灵（武），集中力量打击敌一二八军，并令六十四军担任主攻，六十三军沿黄河北上，协同作战。六十四军一九一师迅猛出击，于9月17日至19日相继攻占牛首山、广武岭、青铜峡等地，直向金积前进。敌人惊恐万分，纷纷向金积、灵武败逃。驻守金积之敌三五六师，竟然决堤放水，淹没大片良田民宅，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9月20日，一九一师、一九二师向金积之敌发起攻击，扫清外围各据点，消灭敌3个团，从东、南、西三面逼近金积城。卢进民等见势不好，一面通电求和，一面加强吴忠堡的兵力部署，妄图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9月20日晚，六十四军一九一师、一九二师迅即北上，与迂回吴忠东北的一九一师五七一团、独一师等会合，围歼驻守吴忠堡之敌。

9月21日凌晨，一九二师五七五团强渡涝河，攻占了敌桥头阵地，守敌保三师大部被歼。卢忠良亲率二五六师和3个骑兵团从灵武赶来增援，遭人民解放军炮火痛击，被打得四下溃散，卢忠良只身逃回银川。同时，一九二师、独一师攻占吴忠堡，俘敌官兵近千人，敌二五六师和一二八军军部一部向灵武逃窜。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迅速包围灵武之敌，迫使敌军投诚。至此，经过3天4夜的激战，宁夏河东的敌人全部被消灭。

金灵之战给“宁马”以沉重打击，使“宁马”防线全线崩溃，首府银川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之下。国民党当局极度恐慌，派来非正式代表求和。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告诉他们：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进银川，一定要解放宁夏，这一任务是不能变更的。宁夏当局务必于24日12时前派出正式代表来谈判，否则即坚决歼灭之。9月22日上午，马鸿宾遵照彭德怀电报精神，出面收拾残局，召集在银川的宁夏军政要人开会，商派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为全权代表，速往中宁求和签字。9月23日，第十九兵团代表杨得志、李志民和国民党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等在中宁签署《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

70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而革命先烈为人民敢于牺牲一切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正是有了这种精神的滋养，当地各族儿女在党的领导下，攻坚克难、积极进取，团结互助、奋发有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取得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后，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大步迈进。

（据《中国共产党宁夏简史》）

梁朝桂事略（二）

渡海赴台湾平定“林庄事件”

林爽文，福建省漳州府平和县人，以耕田、赶车为业，募众垦田致富。乾隆三十九年（1774），参加严烟组织的天地会，不久成为台湾彰化地区天地会的重要首领之一。天地会在台湾秘密流传，迅速发展，抗拒官府，清廷令其解散。

《清史稿·列传第115》载：“五十二年，台湾林爽文为乱，庄大田应之，别为南路余。朝桂率兵败大田于莺松，斩获二百余。贼众数千犯大营，击却之，毙贼三百。将军常青虑南路贼北扰诸罗，檄朝桂堵御，连败之南潭、中洲、十三里庄，歼数百人。九月，常青移师北路剿爽文，以朝桂守台湾府城，贼来犯，击走之。”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时任广东高廉镇总兵的梁朝桂奉命率本镇兵马渡海，从台湾南部登岛参战。梁朝桂的宁夏汉族军队上岸后就与庄大田部相遇，双方经过两次激战，大败庄军，首战告捷。自此，梁朝桂的部队军威大振，庄军闻风丧胆。此时将军福康安尚未接任，原总督常青命令梁朝桂一军独当南路，以阻止庄大田军北犯府城。梁军很快就在南潭、中洲、十三里庄等地接连挫败林庄部，梁军成为平叛“林庄事变”的一支劲旅。之后又被调到台湾府，担任守卫府城的重要任务。

是年冬，参赞大臣、福州满营将军恒瑞所部被困于盐水港，梁朝桂亲率精兵偷袭敌营，解救了恒瑞的八旗军。梁朝桂又与恒瑞合兵一处，从鹿仔草出发，进剿镇平庄守敌。战斗中，梁朝桂勇不减当年，身先士卒，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指挥，终大获全胜。梁军牢牢控制住盐水港和鹿仔草要地，使敌军无法前进一步，保障了府城的安全。盐水港是台湾最古老的乡镇之一，原居住有西拉雅族，在郑芝龙、颜思齐来台前（1621年）就已有汉人移民进入，是船只进入八掌溪的集散地，清雍正年间设盐水港堡。当时戴罪立功的台湾提督柴大纪，被敌围困于诸罗，向梁军求救，梁朝桂决定亲自驰援，但恒瑞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不许梁军行动。柴大纪不敢冒犯满洲大员恒瑞，反而向朝廷告了梁朝桂的御状。朝廷不但未追究梁朝桂，反而受到表彰，再次赏戴双眼花翎，穿黄马褂，赐奋勇巴图鲁（蒙语，子爵）名号。

这时庄大田部仍然屯居于大武陇至麻豆庄一线交通要道，继续威胁着府城的安全和南北驿塘的畅通。恒瑞又把打通交通线的任务交给梁朝桂。梁接到命令后，火速率部轻装潜行，自茅港尾绕至阿里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拿下港城，又快速赶赴打狗、竹仔各港口，堵截残敌逃往海上。此役不仅疏通了官道，而且迫使庄部节节败逃，一直从牛庄退到台湾最南端的琅峤。庄军依山靠海，顽强抵抗，但已是强弩之末。福康安率8000人出发，于12月10日（阴历11月2日）自鹿港登台，上岸后再招团练6000人，总兵力1.4万人，分6路南下向海港逼近，会同梁朝桂部杀退林爽文，解了嘉义城之围。此前，梁军已把庄大田残部死死锁围在琅峤，给大军全歼庄部创造了条件。

福康安和梁朝桂带兵进入嘉义城，休息了一天后，由海兰察打头阵，福康安和梁朝桂率兵作后应，林爽文、庄大田军放弃大里杙，撤至“内山”集集埔、水里化等高山族聚居地区，继续抵抗。清军多路出击，当地百姓，配合官兵搜捕叛军，狂攻了六天六夜，打得天地会死伤累累。于仑仔顶和牛稠山连败叛军，乘胜占领大里杙庄和集集埔，大理栈被一鼓作气荡平。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十四，在老衢崎，林爽文及其家属和多名会党被生擒。庄大田率余部退入台湾最南端的琅峤，不久庄大田和大小头目40余名被活捉。林爽文、庄大田军群龙无首而解体，台湾事变告平。庄大田在台湾被处死，后林爽文被押解到京城被杀。

梁朝桂在平定台湾的战争中又建大功、奇功，朝廷再予特别表彰，被列入20功臣中第15名，第2次重新画像，陈列于紫光阁。乾隆皇帝亲写赞语：“金川剿逆，埋根进首。盐水恒瑞，未免掣肘。及防麻豆，御贼坚守，受创力战，嘉哉鲜偶。”梁朝桂享受此等殊荣，在清代的文武大臣之中是不多见的。

乾隆五十三年春，梁朝桂“擢福建陆路提督”。因“金门巡洋舰被劫，以朝桂不能戢盗”，调任广西提督，后又升任湖广提督。

乾隆五十九年（1794），梁朝桂病逝在任上。临终怀念家乡，嘱托亲人将其尸骨运回广武。

（据《宁夏文史》）